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on a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经验浅析 [Briefly Analyzing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Experience]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刘, 慧敏;刘, 余莉
Publisher	中共中央党校、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6-13 04:37:33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5451

刘慧敏 刘余莉：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经验浅析

刘慧敏 刘余莉

摘要 中国传统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道德教育方面累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认真总结和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改善和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道德教育 儒家 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在道德教育方面更是积累了五千年的经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传统社会的道德教育接受了儒家的观念，切实做到了以下几点：

第一，高度重视道德教育，树立了道德教育的明确目标，并把道德教育视为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宗教教育构成的完整体系。

早在《礼记·学记》上就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就是说，建立一个政权和领导一国的老百姓，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而“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礼记·学记》）教育的目的是“长善救失”，即使人的过失得以挽救，而使人善良的方面不断增长。可见，道德教育是古代教育的核心内容。道德教育必须从修身、即达到身心和谐开始，进而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国与国之间的伦理关系。因此，只有教育办好了，人心得治了，伦理关系协调了，才能从根本上保证人们真正长久的幸福生活。

而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之所以能够奏效，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构成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特别重视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家庭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开始（“育，养儿使作善也”《说文解字》）；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而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扩展，社会教育应当秉持孔子提出的“思无邪”的理念。因此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都遵循着孔老夫子的这一思想，不论音乐、歌舞、戏剧、诗词等等，无不以宣扬道德、弘扬正气为主要内容，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网际网络渗透到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社会教育对人价值观更是起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所以我们的文化部门、新闻媒体，网际网络等，更应当承担起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为倡导和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此外，宗教教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佛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教育。佛陀教育教导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与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自公元67年佛教传到中国后，受到中国朝野的欢迎，成为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教育。而这种艺术化的教育，体现在佛教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形成淳朴向善的民风 and 达到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采取了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强调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

《说文解字》把“教”解释为“上所施，下所效”。儒家看到道德教育的有效方式是身体力行的感化而不是空洞的说教，是开启人的爱心、羞耻心而不是强制灌输一种理念，因此特别强调了“正人先正己”、“身教胜于言教”，强调了作为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者的领导人的道德示范作用。在这方面，孔子多次强调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德行好比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又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

说法。实践证明，“上行则下效”：“上有克让之风，下有不争之俗”，“上清而无欲，则下正而民朴”，“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由此可见，作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的道德修养对于形成一个社会良好的社会风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领导者以身作则的道德示范作用，他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只有仁人应处于统治地位。不仁的人处于统治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群众。追溯历史，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士大夫阶层实现政治理想的过程中，尤其重视个体品格的高低，重视个体人格的力量，良好的个体道德修养成为为官者首要而基本的条件。包拯清正廉明、不畏强权的为官品格；海瑞为民请命、刚直不阿的风范，都为统治者和平民所敬仰。

第三，把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通过各种制度建设保证推行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依靠各种社会制度来加以强化的。简单的讲，社会弘扬什么，就要通过制度激励什么；反对什么，就要通过制度约束什么。英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尔说的好，“当社会不利于人常常运用高尚的情感时，这种情感就会由于缺乏培养而枯死。”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法律、监督机制的健全、激励机制的完善上保障和推行道德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中国古人重视道德教育，但绝不意味着因而忽视了制度的完善和健全。在中国古人那里，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对立、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

例如，为了落实孔子“举贤才”、“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的主张，孟子进一步提出：“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这一观点也为历朝历代的开明统治者所接受，因而注重从官吏的选拔、考核、监察、奖励、培训和管理制度上落实“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1]的主张，这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在接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面临着众多的诱惑。一些领导干部见利忘义，骄奢淫逸，利用自己特殊权力，进行明目张胆的索贿受贿、权钱交易的活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自己谋取私利的资本，结果从受人尊敬的领导者而变成历史和人民的罪人，而且对社会风气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这不仅与领导干部个体的思想道德水平有关，更与我们的人才选拔、考核、监察、管理、激励的机制有关。因此，在强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权力观的同时，在人才选拔机制中贯彻、坚持、健全和完善“德才兼备”的用人机制、落实“举贤才”的主张是极为重要的。

除了从法制、监督机制等方面强化推行道德教育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通过建筑物的设计来有效地强化和实现伦理道德的教育，把伦理道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民间的四合院建筑，正是为了便于实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大家庭的生活。此外，供奉祖宗的祠堂，也承担着教“孝”的功能，教导人知恩报恩，达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效果；而供奉着至圣先师孔子的孔庙，教人尊师重道，使人“志于道，据于德”，因而也承担着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最后，着重培养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能力。

世界所有冲突、不和谐的出现，根源在于利己与利他之间的冲突。因此，要化解冲突，每个人都要首先反省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去指责对方。孟子对这一点的阐述尤为详尽。他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他还说：假定这里有个人，他对我蛮横无礼，那君子一定反躬自问，我一定不仁，一定无礼，不然，这种态度怎么会来呢？反躬自问以后，我实在仁，我实在有礼，那人的蛮横无理却仍然不改，君子一定又反躬自问，我一定不忠。反躬自问以后，我

实在是忠心耿耿的，那种蛮横无理仍然一样，君子就会说，“这个人不过是个狂人罢了，既然如此，那同禽兽有什么区别呢？对于禽兽有什么责备呢？”所以君子有长期的忧虑，却没有突发的痛苦。这样的忧虑是有的：舜是人，我也同样是人。舜呢，为天下的楷模，名声传于后代，我呢，仍然不免是一个普通人。这个才是值得忧愁的事。忧愁了又怎么办呢？尽力向舜学习罢了。至于君子别的痛苦那就没有了。

在《中庸》上也说，“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反求诸其身。”意思是说，我们做事如果没有成功，我们应当马上反过头来从自己身上发现不足。这正如一个射箭的人，如果他射箭偏离了靶心，他不是去寻找客观的原因，而是回过头来反省自己的技艺不精湛。孔孟所称道的尧舜禹汤等古代的圣人，都是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楷模。商朝的汤王，在自己洗脸的盆子上面刻了一段话，“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2]时时督促自己要不断进步。汤王遇着大旱祷雨时又提到：“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只要我自身有罪，不要因为我的过失殃及到天下百姓的身上。天下的老百姓有罪，都是我自己没做好，都该由我自身负责。周武王也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论语·尧曰》）正是因为上古的圣王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才能够把国家治理得好。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社会风气的好坏，与社会中的每个人息息相关，而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对社会风气的好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不仅是每一个领导者，而且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当有这样“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态度。陈寅恪说过：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而作为读书人，作为知识分子，更应当具有这样的反省能力。应当说，从自己做起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和道德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也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

古人说：各相责，天翻地覆；各自责，天清地宁。如今小至家庭夫妇之间的冲突，大至种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从很多的程度上都是由于彼此之间只知道责怪对方，而不能反躬自省而导致的。只有人人都能做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最终化解冲突和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和世界的和平。

[1] 《汉书》卷6，第167页，中华书局出版社1962年版。

[2] 《大学》：“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